



沁园春

——写在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8周年之际

蒋定之

千古垂名，
万世巍巍，
日月润之。
念累累勋业，
风云叱咤，
狂澜不倒，
天铸英姿。
八角楼头，
井冈号角，
点检罗霄问鼎师。
长征路，
四度翻赤水，
酣畅淋漓。

东方拂晓征衣，
人道是今胜昨已非。
喜精神犹在，

初心犹在，
复兴梦想，
剑指多时。
百十年来，
神州砥砥，
纵有危机路未迷。
尤堪赞，
是新义执手，
筑太平基。

注：
1.润之：毛主席字润之，此处为双关语；
2.新义：新的思想。

(作者系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政协原主席)

诗意图鉴

觉晓”，或者“床前明月光”吧。但读诗的经历不同，给人带来的影响就有不同。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9岁生日那天，姐姐竟从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书送给了我。那是一本诗集：《回声》，作者金波。一个小学生哪懂什么是诗啊。然而，当我翻开这本绿色封面的小书时，一下被吸引住了——

这绿色的山谷多么好，
有这么多红的花，绿的草，
还有满山的果树，
结着鸭梨、苹果和蜜桃。
这里还有一位小伙伴，
他整天在山谷里奔跑，
多少次我想见他一面，
只因山深林密找不到。
可是我唱山歌，
他也跟着唱山歌；
我吹口哨，
他也跟着吹口哨……
如果你想知道他的名字，
你就向群山问一句：
叫你“回声”好不好？
他准会答应一句——“好！”

李培禹

多美的意境，多纯的童心啊！除了这首《回声》，我至今仍能记得的还有《林中的鸟声》《雨后》《卢沟桥的狮子》《走过高门楼》《怎样做时间的主人》《在老师身边》等。这优美的诗句陶冶了我的情操。当然，后来读了一本又一本诗集，然而，《回声》却真的像那山谷间的回声，绵绵不绝地刻录在我知识库的“内存”里。

《回声》可说是我与诗歌结缘的启蒙读物，我一下记住了诗人的名字——金波，产生了崇拜诗人的情愫。后来我与金波先生成为忘年交，那是另一个故事，这里暂不多述。是不是可以说，每个人读到的第一本诗集至关重要，如果你遇到的第一本诗集翻开后索然无味，或是很难读懂的晦涩的句子，怕是你会躲开它远远的，不会对诗歌产生什么好感和兴趣了吧。

我少年时开始喜爱读诗，那时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也写诗，本能地对那些分行、押韵的文字格外敏感。我的诗歌情缘还与我上的中学分不开，那个时期不用考试，而是就近分配，我得以幸运地进入了北京二中这所名校。初中、高中的5年时光在这所文化底蕴深厚的学校里度过。学校有一个诗歌小组，指导老师是诗人尹世霖，当时他的诗集《红旗一角的故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还上了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影响很大。而那个年代能够正式出版诗集的诗人凤毛麟角，记得仅有贺敬之、李瑛、李学鳌等。著名散文家韩少华也在北京二中执教，他的散文名篇家喻户晓，可谁读过韩老师写的诗呢？我读过！那是一首长诗，语言清新、意境辽阔、韵律优美，读来朗朗上口。不知那首诗后来是否发表了，但对如饥似渴的我，却是多么难得的文学滋养啊。忆少年，是北京二中“催生”了我的第一首诗，那年学校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长跑活动，校长广播站的老师找到我，让我写一首朗诵诗，要求像当年长征途中给战士们鼓励那样的诗。我一点没犹豫，连夜写出来第二天就交稿了。长跑活动开始那天，全校师生都听到了我的诗《新的长征》，由同学中朗诵最棒的张慧朗朗诵，她的声音特别好听，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其实，中学生少年爱上诗歌是很自然的事，只是当年那个“文化荒漠”的时期，几乎没有更多的诗集可供我们读啊。在北京二中中让我觉得离诗比较近的原因，一是有一个由诗人老师指导的诗歌小组；还有一个是，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的著名诗人光未然的孩子张安东、著名诗人艾青的儿子艾丹，都是我同班同学。后来几十年后我们见面，他们虽然都在各自的文化领域成绩卓著，却都没能成为诗人。我和他们笑谈：只有我算与“诗人”沾了点边儿。

(作者系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

一言难忘

写作与思考

朱永新

在硅谷让我感到非常有价值的方面，就是写作。不管是做科学的，做技术的，做创新的，如果你能写好一篇好文章的话，其实你都不需要成为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小说家，基本上比普通人好一点点的话，那你就有很好的亮点了。你就可以获得别人的关注，你就能够获得别人的青睐。应当说，过去这10年当中最成功的这些风投家，他们之前都写过长篇大论的博客。如果说你也能很好地写作的话，应当说，在硅谷是很好的敲门砖。

——(美)彼得·蒂尔

写作是人运用语言文字符号反映事物状况、表达思想感情、传递知识信息、实现交流沟通的活动。一般认为，写作只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事情，尤其是作家的事情。但是，美国有研究机构对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一般的科学家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有影响力的权威科学家和普通的科学家，他们的差别主要不在智商，不在学历，不在性别，甚至也不是科学素养、行动力、专注力、思考力，根本差别在于写作。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获得诺奖的科学家，其写作能力比非诺奖科学家强许多倍！更没有想到的是，企业家的写作能力居然也如此重要。为什么？其实写作不仅仅是文字的清晰流畅、故事的曲折离奇和情感的真挚动人，能够写一篇好文章，更重要的往往是文字背后的思想、思维。钱颖一先生是最早在中国大学开设写作通识课程的。他把《中文写作》《中文

沟通》《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作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最重要的课程，认为写作对于培养思维能力、沟通与表达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写作为什么如此重要？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写作的重要功能，就是整理自己的思维，使不被别人看见的东西外在化。正如作家叶开先生在《写作课》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写作’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彰显暧昧不明的事物。写作如同一束光，照到不被看见的事物上。”硅谷的那些投资家之所以能够如鱼得水、长袖善舞，与他们的沟通表达才华和很强的写作能力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写作，不仅仅是作家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

真正的逆向思维是自己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也不是要跟周围的人唱反调，而是思考有意思、其他人甚至都没想过的问题。所以逆向思维就是探索你感兴趣但别人还没发现其有趣之处的方面。

——(美)彼得·蒂尔

彼得·蒂尔是PayPal公司的创始人和Facebook首位外部投资者，也是畅销书《从0到1》的作者。2016年3月25日，他和钱颖一先生在清华大学做了一个《理解历史，洞察未来》的对话，对逆向思维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他认为，逆向思维并不是为了和别人持不同意见，不是在主流舆论前面加一个负号，而是真正能够提出与别人不同而且高质量的问题。成功的博士生和

不成功的博士生的差别也在这里。他认为很多人既聪明又努力，但是因为从来没有提出真正正确的问题，或者，“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在问、很多人都在研究的问题，因此难以脱颖而出。”或者，问题虽然有趣，但是“不可能回答，也难以取得很大进展”。所以，他认为要提出那些非常有趣但是别人仍然没有发现其有趣之处，既有一定难度但是也可以挑战解决的难题。一句话，逆向思维的起点，不一定是给出不同答案，而是“提出没有人问过的好问题”。

每一个学生在读过选定作品后，写下三个自己想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各自选择同伴，相互提问准备好的问题，互相协商，从中选择三个彼此都还想多做探讨的问题。接着，每两组合为一组，也就是四人小组重复上述提问的过程，最后只能保留一个大家都想深思的问题。每组最后“存活”下来的问题就由全班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淘汰制”最妙之处在于学生的高度参与。

——(英)艾登·钱伯斯

“抓鬼游戏”是加拿大一所大学的英文系教授道格·希尔克提出来的。看起来名称不雅，但是其实很简单，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问题用于讨论的筛选流程。具体方法是每个人在阅读结束之后，写出三个自己想要进一步深入思考探究的问题，然后再选择一位自己的伙伴，两人组成一个小组，在各自三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协商讨论，筛选出两人认可的三个问题。然后，再与另外一个小组

组的两位组成四人小组，再次筛选出大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最后由全班同学共同讨论，决定最后“存活”下来的问题，这就是大家抓出来的“鬼”。钱伯斯认为，这样的“问题淘汰制”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学生的高度参与，“每个人都兴致勃勃，毕竟讨论的问题都是自己提出的问题。每个人既是提问者也是解答者”。其实，问题筛选的过程，就是对所读作品的思考过程。不同读者从不同角度筛选出来的问题，有助于丰富各自对作品的理解，而彼此讨论抓出来的“鬼”，自然也是孩子们觉得挑战性最大、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

钱伯斯，这位曾经获得过安德生奖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对于儿童阅读的研究如此深入，引起了我们国内许多资深阅读推广人的感叹。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王林博士对我说，《说来听听》实际上是讲述教室的讨论氛围，而这种氛围特别是围绕“聊书”展开的。据说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大力提倡“整本书阅读教学”，他很担心因为这样的“大力提倡”，破坏了“聊书”的闲适，进而破坏孩子阅读的乐趣。所以，钱伯斯关于如何参加教室里的“聊书”讨论，对当前的“整本书阅读”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书苑走笔

写一部中共一大的国民读本

徐剑

也许是因为当年毛公润之的身影覆盖了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故对中共一大党史的宏大叙事，多少有点耳熟能详。尽管那些年有些事，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屏蔽，未能探知历史真相，仅略知一二。但是，随着时间巨流河奔涌，有些记忆渐次模糊了，有些阅读则清晰如昨。因此，当某一天，有出版方邀我写一部党的一大文学读本时，先是愕然，继而肃然，最后欣然从命。

答应写作此书后，我向出版社提出一个额外之请，读书行走，走访13位会议出席者的诞生地、求学地、战斗地、壮烈地，乃至叛徒者的死无安葬身之地，看见别人未曾看过的地方，发觉他人未曾发现的东西，激活未曾觉悟的迷障。这博得对方激赏。我知道，真的要跃入时代的激流，在岩浆运行奔突的烈焰中燃烧一回自己。

半年采访，盛夏入荆楚。唯楚有

材，于斯为盛。13位一大出席者，五位出自湖北，两位来自湖南，可见当时两湖天空群星璀璨、英才列列。第一站是应城市刘仁静的老家，住国家电网培训中心，旁边是应城市革命纪念馆。放下行囊，便与该纪念馆馆长相谈，竟不知刘仁静为何人。未了，推荐了一位姓朱的老人，耄耋老人见到我，惊叹，40年了，你是采访刘仁静的第二人。

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其实考古般的田野行走，印证了我的一个创作信条：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见的东西不写，听不到故事不写。

在何叔衡老家，面对着那座大宅院，我看到他一度也在那条船上，考秀才、考功名，可是当他意识到，跟着体制走，中国已无希望和前途时，毅然与旧世界决裂，此后一生都在赶考。当教书先生时，他是开明绅士，号称宁乡四杰；后又上新学，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润之是同学，一起出湘，参加一大；20世纪30年代初，他又远赴莫斯科留学。返回上海时，得知其养子、大女婿，中共湘东南特委书记夏尺冰头悬长沙城门时，他安慰大女儿实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有牺牲的。撤往苏区后，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内务部部长，握着党的刀把子，一次次刀下留人，决不错杀一个。长征前，他被留下来打游击，活下来概率几乎为零。江西梅坑，一盘花生米、一壶老酒，他与老友林伯渠，将实山、实嗣姐妹织的毛衣脱下来，赠给林伯渠，说山高路远水寒，请君保重。送战友、上征途，天破晓时，便是生死别离。从此，壮士无归路。他的夫人袁少娥在老家守望了一辈子，直到新中国成立，该回来的都回来了，为何丈夫不

归？却不敢问两个女儿半句，爹爹可好，是死，是活，还是已经新娶？弥留之际，唯一愿望，生不能同日，死可以同穴。可是何叔衡与瞿秋白一起突围时，被白军枪杀于山野，遗骸难寻。我站在何老夫人墓前，纳闷苍穹，叔衡老英雄何时能归！

还有董必武，长征时，爱人也不在长征名单内，痴情的妻子一路相送，跟着队伍走了三天，将到五岭时，夫妻挥泪相别。念去去，五岭迢迢，乌蒙磅礴，一对相爱的人从此天上人间。时隔多年后，董老忆及此，吟一首情诗永记，题毕，顿老泪纵横。

就这样一路走来，从韶山走到独秀峰。第一晚抵达时，天降小雨，翌日风和日丽，晨曦从韶峰冉冉而起。拜谒毛公铜像时，仰望蓝天，天边湛蓝，那种蓝是哈达般的蔚蓝。我已经多次来韶山了，那天重游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老人家在最后19个小时生命里，看看文件达11次，加起来1小时50分钟，下午4点30分最后一次阅读，次日凌晨溘然离去，令我辈汗颜。雄才大略从何处来，从5000年文明长河中流淌而出。再看那件72个补丁的睡衣，瞬间让我拂悟，一件睡袍挡百姓风雨、苍生冷暖。

随后10天，我从韶山往独秀峰一路走去，至何叔衡之家，至沅陵寓溪周佛海老宅，然后从怀化坐高铁到重庆，走进江津石墙院陈独秀的最后岁月。一个并不大的纪念馆，我居然安静地看了三个半小时。那一刻，少年碎影中的陈独秀拼图完成了，陈公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狷介性格，注定了命运悲剧。徜徉独秀园，不由得嗟叹：安庆人民善待自己的儿子陈独秀，以近似本纪的规格，厚葬了他。

行至水穷处。采访结束回到北京，刚写了不到一个月，新冠肺炎疫情掀起，我蛰伏于永定河孔雀城，伏案五个半月，每天从早晨7点写至子夜时分。到4月上旬，免疫力下降，患上带状疱疹，腰缠半边龙，痛了一月之久，各地的亲朋纷纷给我寄药，解我小恙。当31万字《天晓1921》落下最后一个句号时，喜极而泣。10天会期之瞬，写尽百年沧桑，追随13位党代表身后踽踽独行，经历一场炼狱之旅。推开窗子，时春光明媚，百鸟啼鸣，铁栅栏蔷薇花正盛，生活多么安静美好。远天中，南陈北李与13位与会者向我走来，青春与梦想，初心与信仰，忠贞与背叛，牺牲与尊严，壮丽与沉沦，皆还魂归来，跃然纸上。故国神游，积贫积弱不再。百年人生圆一梦，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天晓》从采访至誊青，耗时1载，书稿备案审查，又历时1年半。欣慰之余，我觉得自己拿到了一张党史、国史写作的入场券。感谢行走采访中相助的刘克兴、王跃文、纪红建、王丽君、韩生学、向显祺、李银德先生，慷慨以助，还提供不少孤本绝版。

“天晓”一词，取之庄子“天地”篇“冥冥之中，独见晓焉”之意，摩挲飘着墨香的新书，想到董必武携夫人1964年清明节回到嘉兴，坐画舫，登上湖心岛，伫立烟雨楼，题下“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仍为庄子所语。

2020年5月15日发走书稿，一段红色之旅画上句号，令我此生无憾。“壮年变法”三部曲之第二部落幕，就像打了胜仗凯旋的士兵，交回令牌，等待下一次出征。

10天后，我又去了西藏，去收割《金青稞》。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



《天晓》 徐剑 著

读诗品诗写诗的美好时光

(上)

2020年庚子疫情防控期间，居家防控，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我翻出书架上被冷落多年的《叶夫根尼·奥涅金》《抒情十四行诗集》《聂鲁达诗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等，想集中阅读一下外国诗人的作品。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我藏书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竟有两个译本：一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宗岱翻译的；一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屠岸翻译的。说到屠岸先生的译本，我不能不说到一位我敬重的翻译家、出版家，他叫施咸荣。施咸荣先生是研究美国文学的大家，也是《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编辑和出版者。我青年时代的文学挚友施亮，正是他的儿子。因了这层关系，还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我，就得到了大翻译家施咸荣先生的一批赠书，屠岸的译本就在其中。在《译后记》中，屠岸先生说：“译诗是难事，译莎士比亚更谈何容易。要译文的文义不出错，不是易事，但更难的是传达原诗的风格，原诗韵味。好诗有一种在字面上捉摸不到而能够动人心魄的魅力。”这句话透露出大诗人、大翻译家屠岸先生对诗歌的理解和敬畏，他甚至在某某种意义上理解一个观点，即“诗歌根本不能翻译”。

译诗不易，写诗更谈何容易！但诗的精实真的存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抚着年轻时读过的一本本诗集，我的思绪不禁飞回到了那难忘的读诗、品诗、写诗的美好时光。

读诗

大概很少有人一首诗都没读过，至少你会在小学语文课本里读过“春眠不